

《尚书·酒诰》 “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”解

刘 国 忠

内容提要：《尚书》的《酒诰》篇有“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”之语，前贤对其理解颇多歧异。本文结合清华简《程寤》的有关内容，认为该句所讲的是周文王受命的情形，而该句中所讲的“惟元祀”应是指周文王元年。结合《程寤》，我们可以知道《酒诰》与周文王受命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。

关键词：《酒诰》 《程寤》 文王受命

《酒诰》是《尚书》中的重要一篇，千百年来深受学者们的重视。该篇开头有一句“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”，学者们对它的理解存在着不小的歧异。

伪孔传将该句解为：“惟天下教命，始令我民知作酒者，惟为祭祀。”^①《正义》：“言天下教命者，以天非人不因，人为者，亦天之所使。故凡造立，皆云本之天。元祀者，言酒惟用于大祭祀。见戒酒之深也。顾氏云：元，大也。”^②这种观点将本句理解为上天之所以教民众掌握制酒的方法，其目的是为了祭祀。这一理解在古代十分流行，如苏轼的《书传》称“天始令民知作酒者，本为祭祀而已”^③；蔡沈的《书集传》亦言：“天始令民作酒者，为大祭祀而已。”^④一些学者还专门对此做了发挥，如有学者称“天之降命，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，以祭祀无酒，则无以荐其馨香，置酒之本意，惟祭祀而已，非以资人酣饮也。”^⑤有学者甚至还提出：“古始惟大祀用酒，小祀犹不用酒。”^⑥这些论述充斥于古代的各种《酒诰》注解之中，这里不再缕述。这种见解把“惟天降命”理解为上天教令作酒，“元祀”理解为大祭祀，其说法成为古

① 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87年，第206页。

② 《尚书正义》卷一三，四部要籍注疏丛刊《尚书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339页。

③ [宋]苏轼：《书传》卷一二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④ 《四书五经》，北京，中国书店影印本，1985年，第90页。

⑤ [宋]时澜：《增修东莱书说》卷二一，收入《通志堂经解》第6册，南京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，1993年，第104页。

⑥ [宋]杨简：《五诰解》卷二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代经学家解释此句的最普遍、最有代表性的意见。

明代马明衡《尚书疑义》对此句的理解略有不同,他认为“惟天降命肇我民”意为“惟天降命于周,以始有此民,即肇国在西土之谓也”。在此马明衡主张“天降命”与“肇国在西土”意义相同,指天降命于周,这与上述学者将该句解为上天教令制酒不同,这是他的特色之处。不过对于“元祀”,马明衡仍然将之解释为“大祭祀”,认为:“天之降命如此,是以有大祭祀而用酒也。”^①在他看来,“元祀”是为了感谢上天的“降命”而举行的大祭祀。因此,这一观点虽然对于“降命”的具体内容看法不同,但在把“元祀”解为“大祭祀”这一点上与传统的观点并没有太大的歧异。

清代孙星衍在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中则把“降命”的“命”读为“名”,把“元祀”释为祭祀最早发明造酒的人,他在书中说“惟者,《释诂》云:思也。命者,《广雅·释诂》云:名也。《释诂》云:肇、元,始也。言思天降下酒名之始,我民当思祀其始作酒者。《书》疏引《世本》云:仪狄造酒,夏禹之臣。又云:杜康造酒。或此云惟天下教命,始命我民知作酒者,惟为大祀。元,大也。”^②按照孙氏此说,“元祀”应该是举行大祭祀,以纪念发明造酒之术的仪狄、杜康等人。这一解释与上述诸家之说也略有区别。

近代以来,对于《酒诰》这句话的解释有了很大的突破。俞樾在《群经平议》中提出了一种新解,他认为“惟天降命”即承上文的“祀兹酒”(按:俞氏认为“祀兹酒”的“祀”读为“已”,意思是止酒即禁酒)而言,“谓止酒非一人之私言,惟天降命也。盖重其事,故托之天命耳。‘肇我民,惟元祀’,言与我民更始,惟此元祀也。‘元祀’者,文王之元年。上文言肇国在西土,肇国者,始建国之谓,故知是文王元年也。曰‘元祀’者,犹用殷法也。盖文王元年即有此命,故云然耳”^③。俞氏此论,将“惟天降命”理解为是上天降命让人禁酒,而与传统的上天教令民众造酒不同,颇有些神道设教的意味。至于“元祀”,俞氏解为“元年”,认为是周文王元年。俞氏坚信周文王生前曾经称王改元,并写有《周文王受命称王改元说》一文详述其意见^④。俞氏将“元祀”解释为周文王元年,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。至于俞氏把“惟天降命”解释为禁酒时“盖重其事,故托之天命耳”,则不免有一些牵强附会之嫌。

王先谦在《尚书孔传参正》则把“命”字理解为“性命”的“命”,在他看来,

① [明]马明衡:《尚书疑义》卷五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② [清]孙星衍: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,北京,中华书局,2004年,第375页。

③ [清]俞樾:《群经平议》五,收入《清经解续编》卷一三六六,上海,上海书店影印本,1988年,第1052页。

④ [清]俞樾:《达斋丛说》,收入《春在堂全书》第3册,南京,凤凰出版社,2010年,第41页。

“惟天降命，肇我民”就是上天降命赋性，肇生我民。书中言“‘惟天降命，肇我民，惟元祀’者，《释诂》云：‘元，大也’。惟天之降命赋性，肇生我民，所以报本反始者，惟祀为大。就祀事推言之，祀必有酒，重祭神也”^①。这也可备一家之说。

在《酒诰》这句话的解释方面，王国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王国维在《观堂集林》卷二《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》中指出：“《酒诰》云：‘惟天降命肇我民。’‘天降命’，正与下文‘天降威’相对为文。《多方》云‘天大降显休命于成汤’是也。传以为天下教令者，失之。‘天降命’于君，谓付以天下。君降命于民，则谓全其生命……”^②在给清华国学院学生讲课时，王先生更明确地指出，“惟元祀”即是“指文王受命改元，非指祀事”^③。按照王氏之说，天降命就是上天将天下付与周文王，元祀则是文王受命改元，而不是祭祀之事，这与前贤的理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。

王国维的这一见解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赞同，如王氏的学生杨筠如在《尚书覈诂》言：“降命，古成语。王师谓‘天降命’，正与下文‘天降威’相对为文。《多士》：‘天大降显命于成汤。’天降命于君，谓付以天下。盖降命，皆有右助福佑之义也。至君降命于民，亦然。《多士》：‘昔朕来自奄，予大降尔四国民命。’又曰：‘乃有不利用我降尔命。’其义亦无不有降福之意也。肇我民，与上文‘肇国’同意。元祀，谓天子受命改元而后称元祀。惟，《玉篇》：‘为也。’‘为’与‘作’同。《洛诰》‘以功作元祀’，即其证也。”^④曾运乾在《尚书正读》中更进一步指出：“惟天降命，犹《康诰》言‘天乃大命文王’也，肇我民者，犹《康诰》言‘用肇造我区夏’也。元祀者，《史记》云：‘诗人道西伯，盖受命之年称王’也……此文语亦倒，犹云‘惟天降命，肇我民，惟元祀，厥朝夕诰毖庶邦庶士’云云也。”^⑤此外，屈万里、刘起釭、臧克和等先生也都支持王国维的意见^⑥。

虽然王国维等学者已经将“惟元祀”理解为“文王受命改元事，非指祀事”，但是当代的大部分学者仍多信从古代经学家们的意见，如周秉钧《尚书易解》：“惟，思也。命，如‘天命有德’之‘命’，对‘天降威’言，谓福命也。此黄式三说。

① [清]王先谦：《尚书孔传参正》卷二〇，四部要籍注疏丛刊《尚书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2710页。

② 王国维：《观堂集林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79页。

③ 吴其昌：《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》，收入《古史新证》，北京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245页。

④ 杨筠如：《尚书覈诂》，西安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278页。

⑤ 曾运乾：《尚书正读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4年。

⑥ 如屈万里《尚书集释》称“王国维《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》（见《观堂集林》）云：天降命于君，谓付以天下。肇我民，意犹上文所云肇国。惟元祀，谓开国改元也。”见屈万里《尚书集释》，台北，联经出版公司，1983年，第159页。在《尚书今注今译》（台北，商务印书馆，1984年，第107页）一书中，屈氏将之译为：“老天降下命令使我们开始拥有这些百姓们，于是我们就开国改元了。”刘起釭《尚书校释译论》（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1386—1387页）也引用了王国维的观点，但引文中有一些错误。臧克和《尚书文字校诂》（上海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332—333页）也以王国维之说解本句。

肇，《周语》注：‘正也。’正，治也，见《吕览·顺民》注。肇我民，谓治理我民也。元，大也。惟元祀，惟大祀可饮酒也。蒙上文‘祀兹酒’而省。言须思天降福命，使治理我民，惟大祭之时可饮酒耳。”^①此外如《尚书注训》、《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》、《今古文尚书全译》等近期出版的《尚书》注释之作，也都遵奉伪孔传等古代经学家们的意见^②。因此，如何正确理解阐释这句话，仍然是摆在学者们面前的一件事。

幸运的是，清华简《程寤》篇的问世，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契机。

2008年7月，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，入藏了一批流失境外的古代竹简，近两年来，这批被人们称为清华简的珍贵材料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，媒体也进行了大量的报导。据统计，清华简总数近2500枚（含残片），其时代为公元前305年左右，属于战国中期偏晚。根据目前初步的编排结果，清华简总共约有64篇文献，其中多为经、史一类的典籍，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，其中尤以《尚书》的重新发现最为引人注目。众所周知，目前传世的今文《尚书》系汉初由伏生所传下来的，为秦火之余，而古文《尚书》则已公认为伪书，而现在新入藏的清华简由于属战国时期的写本，未经秦火的劫难，更能体现《尚书》的原貌，因此它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，其作用难于估计。

清华简中虽然尚没有发现《酒诰》篇，使我们无法对该篇进行系统的校正，但是在清华简中再现的《程寤》一篇，对于讨论“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”一句的含义有重要的帮助。《程寤》篇原来见于《逸周书》，但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佚失，现在仅有部分佚文存世，后人已无法得知其全貌。清华简《程寤》篇全篇相当完整，内容十分重要。该篇的开头有这样一句话：

佳王元祀正月既生魄，大妣梦见商廷佳棘，乃小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，化为松柏棫柞，寤惊，告王，王弗敢占，召大子发……占于明堂。王及大子发并拜吉梦，受商命于皇上帝。

这段话在一些传世文献中曾存有佚文，如《艺文类聚》卷七九《梦》言：“《周书》曰：大妣梦见商之庭产棘，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，梓化为松柏棫柞，寤觉，以告文王。文王乃召太子发，占之于明堂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，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。”^③两者相比，除个别字句不同外，内容基本相似，大意是周文王妻子太妣，梦见商朝的王庭里长满了荆棘，而太子发则取来周庭里的梓树，种到了商朝的王庭中，结果梓树化成了松、柏、棫、柞等各种树木。太妣做了这样一个梦之后，非常吃惊，

① 周秉钧：《尚书易解》，上海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，第172页。

② 见黄怀信所著《尚书注训》、钱宗武和杜纯梓所著《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》、江灏和钱宗武所著《今古文尚书全译》等书的相关讨论。

③ 《艺文类聚》卷七九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1355页。

赶紧告诉了周文王，周文王把太子发找来，在明堂里占测了一下这个梦的吉凶，结果发现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梦。原来，商朝王庭里长满的荆棘，实际上是表示商朝朝廷里有许多恶人和恶事，而太子发把这些荆棘除去，种上了周人的梓树等树种，象征的是太子发根除了商朝的恶人和恶事，取代了商朝，所以整个梦的内容，意味着太子发将灭掉商朝，取而代之，让周“受商之大命”。于是，周文王和太子发都对上天拜谢，感谢上天把商之“大命”赐给了他们。这件事很可能与周人所津津乐道的周文王获得天命亦即“文王受命”有密切关系。

清华简《程寤》与传世的有关佚文最大的一个差别在于，简文中明确记载了此事的发生时间是“惟王元祀”，也就是周文王元年，它不仅印证了周文王生前已经称王，而且证明周文王元年时即已获得天命，而商则已经丧失了天命。

如果把《程寤》的这段话与《酒诰》的“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”相对比，我们就可以恍然，原来“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”所讲述的正是《程寤》的这个事件，也就是《康诰》所说的：“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，诞受厥命，越厥邦厥民”；而《顾命》所言“皇天改大邦殷之命，惟周文、武，诞受姜若，克恤西土”，含义也应该与此相同；至于《大诰》所讲的“天休于宁王（按：此处的“宁王”及后面的“宁王”二字皆为“文王”之误），兴我小邦周；宁王惟卜，用克绥受兹命”之语，正是对《程寤》所载这一事件的总结。现在我们据清华简《程寤》，已经知道这件事的发生时间是“惟元祀”，亦即周文王元年。因此，周文王在其元年时就已经获得了上天之命，将要取代商朝。借用《文侯之命》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”^①。

商、周时期关于天命转移的这种观点屡见于文献，殷商之所以建国，也是因为上天降命于成汤，命他灭夏。如《多方》言：“天惟时求民主，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，刑殄有夏”；清华简《保训》亦言成汤“用受大命”。而到了商朝末年，上天又降命于周文王，令周灭商。商人之所以丧失天命，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，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是商人“沉酗于酒，用乱败厥德于下”（《微子》）、“诞惟民怨，庶群自酒，腥闻在上。故天降丧于殷”（《酒诰》）。传说中的商纣王营建酒池肉林，为长夜之饮，正是商末乱政的典型写照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上天降命于周文王，让他灭商，就成了势在必然之举了。而《酒诰》所要阐述的，正是这一过程。

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来分析，我们对《酒诰》的认识可能会与前贤有些不同。

^① 《尚书》中关于文王受命的记载还有很多，如《君奭》：“我道惟宁王德延，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”、“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，其集大命于厥躬”；《多士》：“弗吊昊天大降丧于殷；我有周佑命，将天明威，致王罚，敕殷命终于帝”；《召诰》：“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。惟王受命，无疆惟休，亦无疆惟恤”等。金文中有关文王受命的记载也极其丰富，这里从略。

《酒诰》的第一句说“明大命于妹邦”，前贤多认为是“明施大教令于妹国”^①，亦即“明白地发布一个大的命令于妹邦”^②，然而根据我们的理解，大命就是天命，该句是说，要让殷民明白地了解天命的内容，也就是要让殷民认识到商的大命已经丧失，周人拥有了天命。至于“惟天降命，肇我民，惟元祀”则是具体地讲述天命更改的事实及其时间。正是由于殷人沉湎于酒，上天才改变了大命，转而让周文王去灭商，而其时间则是在周文王元年。商人酗酒的危害由此可见，因此周人有必要实行禁酒的措施。这样来理解《酒诰》，可能更符合它的原意。

还有一个问题，“惟元祀”究竟是周文王的哪一年呢？按照传统的说法，周文王曾经有受命称王改元之举，其时间为周文王晚年断虞、芮之讼以后。如果同意这一观点的话，那么这一事件自然是发生在周文王晚年。不过从《程寤》来看，文王受命与断虞、芮之讼是两件不同的事情，不好将之混而为一。因此，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件事发生于周文王即位之初。当然这也还仅仅是一种推测，是否合适，还有待于今后更多的资料发现。

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“出土简帛与古史重建”（09JZD0042）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“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”项目课题“古代简牍保护与整理研究”（2010BAK67B14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（作者刘国忠，1969年生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）

收稿日期：2010年11月30日

① 伪孔传之语，见《尚书正义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影印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1987年，第205页。

② 屈万里：《尚书今注今译》，第106页。